

摇摇摇摇

(京权)图字 园原苑原员缘

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管理委员会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翻译、出版发行中文版。

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三诗人书简 赖奥)里尔克等著 刘文飞译 援

原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员怨怨缘

陈尸岸苑原员苑员原员原原原原

I 援...

II 援①里...摇②刘...

III 援书信 原作品集 原欧洲 原现代

IV 援缘缘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怨怨)第 员园园园号

出版发行摇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摇摇址摇北京西单西斜街 猿号(员园园园)

电摇摇话摇远员园园苑苑摇远员园园苑苑原员愿 远苑

经摇摇销摇全国新华书店

照摇摇排摇北京京鲁排印部(远苑明缘苑)

印摇摇刷摇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开摇摇本摇愿园伊员愿毫米摇员猿园

字摇摇数摇员园千字

印摇摇张摇愿缘

版摇摇次摇员怨怨年 员月第 员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摇员园万册

定摇摇价摇员猿元

总摇摇序

摇摇阿诺德说：“诗歌拯救世界。”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诗”与“思”，也许本来就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精神存在方式。前者是一种本能的、审美的方式，后者是一种经验的、判断的方式；前者诉诸情感，后者诉诸理性。而海德格尔的“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则仿佛在设计此两者的融合。一个大脑基本健全的人，是不可能不思考的，一个意识有了初步发展的人，也不可能不审美，而一个将“诗”与“思”统一于一体的人，就有可能是一个意识活动最为活跃、精神生活最为丰富、情感世界最为多彩的人。

然而，在外部世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彩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人类的“诗”与“思”都似乎越来越少了。在这样一个日益技术化、甚至数字化的时代，人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面对生活的诗意呢？换句话说，在科学的



时代还需要诗歌吗？在有用性、精确性、合理性，还有所谓的可重复性、可操作性等等方面，诗歌无一不显示出了她的尴尬。但是，诗歌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仍永远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她与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之间有着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她诉诸的是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情感。

与此同时，如果不将科学思维和商业智慧等包括在内，人类的非功利思考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对存在及其意义的穷究，正在成为少数哲学家、思想家的“专业”，而整个人类却似乎有了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挣钱）要做，换句话说，在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当代，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状况的关注反而有所降低。将本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一个平行比较，就会发现，前者在这一世纪中所取得的进步据说数百倍于先前所有世纪之进步的总和，而后者的进展却很难说是革命性的，至少不能说有成倍的增长。人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是需要维持某种平衡的，对地球之外宇宙空间的探索与对人类自身基因密码的破译基本同步，但在精神存在研究与物质存在研究这两个方面暂时还是不协调的。因此，人类无疑需要更多地思考。

无论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还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保持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的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诗”与“思”的平衡发展也同样是重要的。我们需要“思”的庄重，也需要“诗”的空灵，我们需要“思”的结果，也需要“诗”的过程，两者都是我们精神生活最基本的立面。这大小两种平衡的谋得和维



持,便是我们最正常的精神存在状态。

要维持这种状态,阅读也许是一种最佳方式,或曰一个捷径。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感受诗意,在阅读中加深思考。当然,人类的文明史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诗”的读物和“思”的文本,也许,我们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如今,我们又从那无数的读本中挑出几册,我们选择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诗”与“思”两种因素的相互渗透上。

这里的几本译作,或偏重于哲学如尼采的《快乐的知识》、克尔凯郭尔的《基督徒的激情》和阿兰的《幸福散论》,或偏重于诗歌如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三诗人书简》、纪伯伦的《先知园》和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但它们的特色却都在于“诗”与“思”的融合上,或者说,它们是思想的诗,或诗意的哲学。它们的作者早我们许久完成了精神和情感的长征,他们在前方呼唤我们:过有思想的生活,过有诗意的生活。

刘文飞

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



爱的寄语(代序)

乌兰汗

摇摇《三诗人书简》是一部诗人肝胆相照、倾诉情怀的书,是一部议论诗学、评论诗作的书。它有文学价值、史料价值,还有探讨文人道德观念的价值。

将三位诗人的书简编纂成书,并用按语衔接起来——编者倾注的心血不可低估。书简——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按语——多方串联,交待人物关系,写得自然流畅。全书读起来有滋有味,令人激动,引人遐想,使人向往阅读更多更深邃更好的诗。

关于此书的内容、每位诗人的感情嬗变,甚至写信人的未尽之言,译者刘文飞在前言与按语中都做了明晰而适度的介绍,再重复就是画蛇添足了。

我国广大读者对这三位诗人——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流亡国外的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既知晓又不熟悉。编者只选择了与三诗人

相互有关的一部分书简,即从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寄给里尔克的信开始,到茨维塔耶娃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为止,最后还附了一封帕斯捷尔纳克致已故的里尔克的信。书简不到五十封,时间不过十个月。这本是他们生活中的一段插曲,但由于三方都以真相见、以爱相待,使这段插曲奏出了动人心弦的乐章。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真诚地向师长里尔克献出一片爱慕之心,里尔克同样真诚地向两位俄罗斯青年诗人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里尔克是三人中间年龄最大的一位。他们通信时他只不过五十有一,但已是生命的最后一年了。他疾病缠身,离群索居,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组诗《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他已别无所求。想当年,世纪末的情绪、一战的凄惨、社会的动荡、新旧观念的撞击、文艺思想的格斗、婚姻爱情的挫折,俱往矣。他一再回避现实,但他的诗却捧出他心中掩饰不住的不安与焦虑,处处渗透着对爱与憎、生与死的思考。他是欧洲新诗的先驱,有众多的追随者与崇拜者,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便是其中的两位。

帕斯捷尔纳克那一年三十六岁,正艰难地向诗的高峰攀登。他早在大学读书时就爱上了里尔克的诗,并试图从德文译成俄文。当他进一步寻找自我时,阅读了里尔克赠给他父亲的几本诗集,得到启发,确定了自己应走的路——放弃音乐,转向诗歌。他父亲写给里尔克的信中提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仰慕:“您应当知道我的孩子们是何其酷爱您的每一首每一行诗啊!尤其是我的长



子鲍里斯，——他是个青年诗人，现在在俄国已颇有名气，颇受重视——他是您的最热烈的崇拜者，最认真最虔诚的敬仰者，他是您的学生，大概也是您的作品的最早的宣传者之一，那时俄国还不知道您。（摘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信）

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在致里尔克的唯一的一封信中，对这位先辈的爱表白得更为明确。里尔克写给他的回信，帕斯捷尔纳克一直珍藏在胸前，说明他的爱何等诚挚和亲切。里尔克去世后，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第一部散文体自传献给里尔克，并专门写了一封信作为该书的跋（见本书第二五〇页）。

许多年后，帕斯捷尔纳克临终前一年还念念不忘里尔克对他的影响，他写道：“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我的习作还是我的全部创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转译和改变他的曲调而已，对于他的世界我无所补益，而且我总是在他的水域中游泳。”（摘自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致法国斯拉夫学专家欧库丘里耶的信）

茨维塔耶娃那一年三十四岁。她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也对德国文化、德语文学怀有特殊感情。她把里尔克视为德国语言和德语文学的象征、诗的象征。她经常诵读里尔克的诗篇，甚至她的女儿在年幼时就熟悉里尔克的名字了。

在里尔克的影响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创作极其重视文字的准确、韵律的严谨、比喻的奇特、格调的高雅。这样的诗在当时无疑属于阳春白雪之作，在高层次知识界反应强烈。随着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他



们的作品日益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所赏识所喜爱。

诗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诗有超意志的魅力,诗是心灵感情的流泻——这或许是他们相似的认识。这些认识使他们相近相亲。当他们单独存在时,各自像星辰一样熠熠闪光。当他们接触到一起时,便会爆发出强烈的电光。那是感情的电光,是爱的电光。

我们阅读他们的书简,字里行间无处不闪烁着爱的光辉。这里有同性相互敬重的爱,也有两性相互吸引的爱。痴迷的爱有时是难以用语言说清楚的,更何况他们是诗人。也许我们不用一般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的爱会更好一些。他们的爱是梦幻中的爱,是超乎现实的爱,是诗化的爱,是爱上之爱。正是这种不寻常的爱,使他们能够那么坦然、那么大胆、那么陶醉地向对方吐露心曲。他们既把对方看成是亲人,又把对方看成是诗的化身,大自然的化身。他们追求的是心身的合一,精神的一致。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女士与里尔克的通信还不足一年,那么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的通信则持续了十三年之久。我们可以想像信中火辣辣的语言,可惜本世纪内我们不可能读到它的全部。茨维塔耶娃的女儿看过母亲遗留下来的大量信稿与笔记后,要求下一世纪初再公开某些资料。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她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提到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感情时说:“我给你抄录几段,很多内容你大概都不知道。她是多么爱你,而且爱得多么长久——她爱了你整整一生!她只爱过我的父亲和你,一直没有爱够。”为什么没有提到里尔克?是疏忽?是有意不提?或者别有考虑?像茨



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那样动情的信是不多的啊！

我国老一辈文学界人士早在二十年代就注意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后来由于他们在苏联文坛上的活动逐渐减少或其他原因,有关他们的报道就中断了。五十年代后半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世界范围引起风波。我国文学界尾随苏联,在没有读到小说全文的情况下,也向这位诗人泼溅污水。这是盲从的教训,并为此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三十来年后,我国在苏联之前,西方之后,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甚至有两种译本,对他又产生了兴趣。近些年,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些诗与散文,包括他的两部著名的自传《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频频在我国面世。《三诗人书简》为研究这位复杂的诗人提供了新的资料。

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到目前为止介绍得相对少一些,翻译她的作品如同翻译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一样,难度较大,但毕竟已经开始,还有待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努力。

如果说当年里尔克的诗曾引起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那一辈欧洲高文化青年人的迷恋,那么它同样也吸引过中国青年,只是不像欧洲青年诗人表现得那么狂热而已。我国最早注意到里尔克的是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德语文学权威和翻译家的冯至先生。

一九二五年暑假,冯至在他叔叔冯文潜那里看到了里尔克的诗集。冯文潜是研究哲学与美学的,他向冯至介绍了里尔克。那时里尔克对于冯至来说还是一个生疏



的名字。曾几何时,冯至在钻研德语文学时开始研究与翻译里尔克的诗和散文。里尔克的诗对冯至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他的十四行诗。抗战期间冯至完成了他的重要诗作《十四行诗集》,这也是我国诗人借鉴外国诗歌形式写成的第一本十四行诗集,是我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曲新声。冯至认为里尔克关于诗和生活的言论对他很有启发,想到自己进入中年,过着艰苦穷困的生活,但思想活跃,精力旺盛,缅怀所崇敬的人物;“观察草木的成长、鸟兽的活动,从书本里接受智慧,从现实中体会人生,致使往日的经验和眼前的感受常常融合在一起,交错在自己的头脑里”,于是他的感情经过提炼化成了诗,中国化的十四行诗。他说:“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要求,另一方面受到里尔克《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的启迪。”可见这位奥地利诗人的德文诗作的生命力与影响之强大与深远。这一点恐怕连里尔克本人也未必能预见到。冯至毕竟是中国人,他没有像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那样不顾一切地表达自己的爱,但他的实践说明他对里尔克的感情绝非一般。

冯至从未放弃对里尔克的研究与翻译。年逾古稀时他还孜孜不倦地推敲修改早年翻译的里尔克诗歌。冯至先生在弥留之际讲了一句话:我现在更理解里尔克了。是对诗的深邃的内涵?是对人生的认识?不管怎样说,里尔克对我国诗人和新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他的生平与创作应当作更深入的研究。近些年,我国报刊不时刊出里尔克作品的新译文。《三诗人书简》为我们提供了他离世前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和在爱的



支配下写成的最后一首《哀歌》。

翻译《三诗人书简》需要对欧洲文化、诗歌艺术、诗人生活有较深的修养与知识。我很高兴刘文飞发现了这部书,认识到它的价值与意义,并不畏惧翻译的艰难,毅然把它奉献给我国读者。

刘文飞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学者。他曾留学苏联,专攻诗歌,在国内获博士学位,其论文是《布罗茨基:诗与传统》。十年来,他相继翻译了不少诗作与散文,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他撰写了一些论文,包括对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的评论,他还编选了数部文集,如《世界青年抒情诗选》等。一九九〇年苏联举行帕斯捷尔纳克诞辰一百周年国际性纪念大会时,他在大会上发了言,会后又参观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故居,凭吊了他的坟墓。

刘文飞具有诗人的感觉与灵性,热爱诗歌又热心于翻译。他是向我国读者介绍《三诗人书简》理想的人选。刘文飞没有简单地做翻译搬运工作,从一国文字译成另一国文字。他根据俄文版本又进一步作了筛选与剪接,使《三诗人书简》更适合于今日我国读者的需要。他在分章上,冠以醒目的小标题,突出每个章节的中心内容。这项工作同样显示出刘文飞对原著的理解与个人的能力。

我相信,《三诗人书简》中译本会充实我国外国文学的研究并能受到我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欢迎。



心笺·情书·诗简

刘文飞

摇摇我们终于读到了这些原本不是写给我们的书信。

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读来却很是新鲜。这首先自然是因为,其三位作者均为本世纪欧洲杰出的大诗人。诗人以写诗为业,但诗人的书信无疑也是其创作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书信尤其是情书,与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情感的真诚袒露。诗贵在真诚,而这些真诚的书信,应该视为三位诗人笔下真正的诗。这些书信,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欧洲诗史上的一段珍闻,更使我们得以窥见三位大诗人心灵的一隅。读着这些书信,我们似直接步入了诗人们那封存着的内心世界。

三位大诗人是在孤独中相互走近的。三人通信的契机,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致里尔克的一封贺信。但这段信缘,还有着比这贺信更重要的内在动因。



里尔克在青年时代就十分向往俄罗斯,并于一八九九和一九〇〇年两次访问俄国,拜会过托尔斯泰。与世纪初充满资本主义危机的西欧相比,里尔克更欣赏古朴、自然的俄罗斯,他一直将“童话国度”的俄罗斯视为他的“精神故乡”。他学会了俄语,曾潜心研究俄罗斯文学和斯拉夫文学,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人的作品,这就是其传记中所谓的“俄罗斯时期”(一八九九~一九〇二)。他曾想移居俄国。甚至,在逝世前的最后两个月里,他还聘请了一位俄国姑娘做秘书,为他朗读俄文作品。而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对德语文学和日耳曼文化的兴趣,并不亚于里尔克对俄罗斯的兴趣。他俩都精通德语,都曾旅居或留学德国。他俩步入诗坛时,里尔克已名扬全欧,他俩便成了里尔克及其诗歌虔诚的崇拜者。然而,最终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却是孤独,是一种面对战后文明衰退而生的孤独,一种面临诗的危机而生的孤独,一种在诗中追寻过久、追求过多而必然会有有的孤独。分别面对孤独的三位诗人,蓦然转身对视,惊喜、激动之后,吐露了心曲,交流出一份慰藉。

这段通信,来到里尔克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一九二六年春,里尔克似乎已“写完了”他的诗。一生浪迹天涯的诗人,终于隐居在瑞士一个幽静的古堡中。严重的白血病,使他感到死亡的迫近。他在怨叹:“我这个人像折断的树枝。”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里尔克接到了茨维塔耶娃热情洋溢的信,并接受了女诗人的感情表白。可以说,茨维塔耶娃的信,是投向里尔克晚年生活的一束阳光,它无疑曾给里尔克带去一些激动,唤起过里尔克身上



尚存的激情。

十月革命后,对现实不理解的茨维塔耶娃感到苦闷。一九二二年,她携女儿流亡国外,先柏林,后布拉格,最后随曾是白卫军军官的丈夫埃夫隆侨居巴黎。她眷恋祖国、眷恋俄罗斯的文化,可是有家难回或有家不愿回。在她目为“喀尔巴阡的罗斯”的俄国侨民界,她时时感到格格不入。她在孤独中写诗,抒写“没有祖国”的忧郁,那些诗后来集为《俄罗斯之后》(一九二八,巴黎)。她也在孤独中积蓄感情,这份感情后来她以不同的方式分给了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可以想见,一封封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来信,曾给独在异乡的女诗人带去多少欣喜。她是这段通信的中介,她书信中的炽烈,让我们感觉出了女诗人一贯的坦荡,同时也反映了茨维塔耶娃当时心境的孤苦,她似有太多的话、太多的情要与她所信赖的人分享。

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和两个妹妹于一九二二年流亡德国后,诗人仍留在莫斯科。一九二六年的帕斯捷尔纳克,正处于创作危机阶段。他试图去理解现实,试图继续他“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一贯主题,可是他无可奈何地感觉到:一切都早已写尽。然而,在这段通信开始的那个春日,帕斯捷尔纳克却完成了作为一个诗人的“再生”。在这一天里,这位苦闷中的诗人接连受到两次巨大的心灵震撼:读了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他终于意识到,还可以用另外的方式继续写诗;从父亲的来信中他得知,里尔克知道他的诗名,欣赏他的诗才,这使他明确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继续存在的理由。受到震撼的帕斯捷尔



纳克走到窗边哭了,在他的泪水中有走出孤独的欣喜。在此之后,帕斯捷尔纳克连续创作出了长诗《一九〇五年》、《施密特中尉》、《斯彼克托尔斯基》和自传《安全保护证》等重要作品。

一九二六年的通信,对于三个诗人而言都极有意义。他们在孤独中彼此敞开心扉,真诚地互诉心曲,同时,也在“对话”中把他们当时的心境敞向了后来的我们。

除往来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的几封短笺之外,这段所谓的“书信三角罗曼史”中的每一信函,都是真正的情书。这些书信,完整地记录了一段三角恋情。这不是一场争风吃醋的情场角逐,也不是一种消闲解闷的两性游戏,这是一种在相互敬慕的基础上升华出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或曰,是一阵骤然在爱情上找到喷发口的澎湃诗情。

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相识虽早,但一开始友谊并不深。对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怀有一种钦佩交织爱恋的感情。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天赋令帕斯捷尔纳克倾慕,茨维塔耶娃自由奔放的天性,也很吸引生性谨慎的帕斯捷尔纳克。但直到茨维塔耶娃流亡国外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才通过书信向茨维塔耶娃表达了爱情。他深情地称茨维塔耶娃为他“生活的姐妹”,视她为自己“唯一的天空”,他将自己对茨维塔耶娃的爱称做“初恋的初恋”,希望与她共享“高层次的生活”。他把茨维塔耶娃介绍给里尔克,同样也出于对女诗人的爱,他想与自己所爱的人分享每一份享受。他没有想到,在他拉着茨



维塔耶娃共同膜拜他们共同的偶像时,他也将作为男人的里尔克横亘在了他与她之间。茨维塔耶娃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帕斯捷尔纳克隐瞒她对里尔克迅速产生的爱。帕斯捷尔纳克感到震惊,但他表现得很克制,在致茨维塔耶娃的信(六月十日)中,他自称“如今清楚了一切”;“如今我爱一切(爱你,爱他,也爱自己的爱情)”,他甚至对茨维塔耶娃说:“我只怕你爱他爱得不够。”在这勉强的宽容中有一种淡淡的绝望。对爱的克制,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更深地埋头于写作。他不再给里尔克写信,却不是因为怨恨他,他继续崇拜里尔克,并在几年后把自传《安全保护证》题献给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欲以沉默悄悄地退出爱情。

里尔克一生爱过许多女人,也曾为更多的女人所爱。但对于来自茨维塔耶娃的爱,他还是始料不及的。这位已近暮年的智慧长者,面临突如其来的爱,似乎有些失措,但他很快坦然起来,平静地、有节制地接受了茨维塔耶娃的爱。他在致女诗人的第二封信(五月十日)中写道:“我接受了你,玛丽娜,以全部的心灵,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现而震撼的全部意识。”在里尔克的信中,虽没有滚烫的字眼,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了他的欣悦。他称茨维塔耶娃为他“硕大的星星”,他给女诗人寄去了诗集和照片,还为她写了一首长长的《哀歌》。这首后来被茨维塔耶娃称为“玛丽娜哀歌”的佳作,既是一首献给茨维塔耶娃的情歌,更是一首探究生与死、物质与精神、爱与永恒的哲学诗。这是诗的结尾:



诸神起先欺骗地把我们引向异性，像两个一半组成整体。

但每个人都要自我扩展，如一弯细月充盈为圆满玉盘。

只有一条划定的路，穿过永不睡眠的旷野，通向生存的饱满。

里尔克将爱情视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他欲越过爱抵达某种“生存的饱满”。他对爱表现出的超脱，曾引起茨维塔耶娃的不满。听说帕斯捷尔纳克因为他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而沉默了，他曾致信女诗人，因自己成了某种“障碍”而不安，并认为茨维塔耶娃对帕斯捷尔纳克“过于残酷”。

茨维塔耶娃是这段三角恋史的主角，她接受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爱，然后又爱上了里尔克，她同时为两个男人所爱，也同时爱着两个男人，不是三个，——茨维塔耶娃一直很爱她的丈夫。这种爱，绝不是轻浮女人的作为，这是茨维塔耶娃那份过于丰盈的爱在以不同的方式展现。茨维塔耶娃曾说：她不爱大海，因为大海是激情，是爱情；她爱高山，因为高山是恬静，是友谊。对激情的恐惧，反过来看，正是她对自己躁动的内心世界的压抑。其实，就其性格实质而言，茨维塔耶娃本人就是一片激情的海洋。她需要多样的爱，也需要多样地去爱。贵族出身的她，面对丈夫是个“贤妻良母”，在他乡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儿女。她爱帕斯捷尔纳克，但那爱情带有某种抚慰性质，有些像姐姐在爱一个“半大孩童”。她爱里尔克，爱得大胆

